



初唐四傑詩集 新譯

行印局書民三 / 書叢譯新注今籍古 / 類 學 文 / 譯注 標福李

李福標
注譯

新 譯

初唐四傑詩集

三民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譯初唐四傑詩集 / 李福標注譯。——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15

面；公分。——(古籍今注新譯叢書)

ISBN 978-957-14-6010-9 (平裝)

831.4

104005988

◎ 新譯初唐四傑詩集

注譯者 李福標

責任編輯 莊婷婷

美術設計 蕭伊寂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5年5月

編號 S 03336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6010-9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劉振強

人類歷史發展，每至偏執一端，往而不返的關頭，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溫故知新，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古典之所以重要，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並不是迷信傳統，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要擴大心量，冥契古今心靈，會通宇宙精神，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

基於這樣的想法，本局自草創以來，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幫助有心的讀者，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我們工作的原則是「兼取諸家，直注明解」。一方面熔鑄眾說，擇善而從；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頗受各界的喜愛，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也有信心繼續推

廣這項工作。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我們注譯的成員，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陣容的充實，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兼採經、史、子、集四部的要典，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

古籍的注譯，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注入一股源頭活水；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

王子安

子安往省父時次馬當去南昌七百里夢水神告曰助風一帆達旦遂抵南昌正遇重陽洪州都督閻伯興大宴滕王閣命胥吳子章預構序以誇容目出紙筆徧請諸客莫敢當子安在席上最少受之不辭閻怒起更衣遣吏伺具文落筆輒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一聯乃矍然曰天才也遂請成文并賦七言古詩極歡而罷其屬文無滯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寤而起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稱為腹藁



王勃像（清上官周繪，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楊盈川

盈川與王盧駱為四傑嘗謂吾愧在盧前
恥居王後重之者崔融李嶠張說謂勃文
章宏逸有絕塵之姿固非常流所及烟与照
鄰可以企及說謂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
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其稱恥
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楊炯像（清上官周繪，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盧
新
都



新都嘗著釋疾五悲等文五悲者已有親遭患遠離已尚儒遭世尚法已好清
淨遭時就悻已有病遭上封禪已有才遭廢不用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
稱重

盧照鄰像（清上官周繪，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駱賓王

賓王亡命後人傳其為僧宋之間嘗游靈隱寺月夜行吟見一老僧問曰何不寐
之問曰偶欲題此寺詩思未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之問愕然有知者曰賓王也



駱賓王像（清上官周繪，乾隆八年刻本《晚笑堂畫傳》）

導 讀

一、初唐四傑及其時代

「初唐四傑」，是初唐垂拱年間青年才俊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的合稱。而此四人，據聞一多先生《唐詩雜論·四傑》的說法，可大致分為兩個陣營，即「王、楊」和「盧、駱」。當然，聞氏主要是從詩風考察的角度立論的。而從其他方面來考察，王和楊、盧和駱也都有相近處，聞說似亦可通。例如，以年齡而言，王勃（字子安）生於太宗貞觀二十三年（西元六四九年）左右；楊炯約生於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年）；盧照鄰（字升之，晚號幽憂子）生年，聞一多《唐詩大系》以為生於貞觀十一年，張志烈《初唐四傑年譜》以為生於貞觀八年；駱賓王（字觀光）生年，聞一多《唐詩大系》認為生於貞觀十四年，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推定為高祖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年）。從此看，王、楊為同齡人，而盧、駱年輩亦相差無幾。從地域看，王勃乃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楊炯是弘農華陰（今陝西華陰）人，盧照鄰是幽州范陽（今河北涿州）人，駱賓王是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王、楊的家鄉離唐中央地區不遠，而盧、駱二人出身相對偏遠。

「四傑」並稱的名號中，王勃排首位，名聲也最大。王勃排首位，主要是以其文學地位為依據的。在四傑中，王勃對龍朔形式主義文風的排斥是最激烈的，這除了他自身的思想原因之外，當時政治形勢

也是原因之一。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十二月上官儀誅死，牽連了兩個與王勃關係密切的人。一是上書推薦王勃的劉祥道，一是王通的門人薛收之子薛元起。這對積極希望入仕的王勃不可能沒有影響。因此王勃大力反對龍朔文風也可能有這方面的因素。而王勃的文名與此可能也有密切關係。《雲仙雜記》卷九記載：「《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可見當時王勃文名之盛。「王楊盧駱」以王勃居於四傑之首，與他的世家地位也關係甚大。他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孫，大詩人王績族孫。其〈倬彼我系〉詩儘管因為化解其家庭內部的矛盾而寫作，然而字裏行間明顯地為其世家望族地位而驕傲。四傑中的其他人則沒有這樣的家族優勢。例如，楊炯雖有從父德裔、德軒曾任地方州縣要職，而其祖父、父親在仕宦上卻無記載，甚至連姓名也湮沒無聞，故楊炯自稱「吾少也賤」。盧照鄰乃范陽盧氏子，其家族似乎在當地有些聲名，然而他很早就離鄉背井，流浪四方，自然也不會有顯赫的家世的支撐。駱賓王父駱履元，官止青州博昌（今山東博興）縣令。在六朝以至唐初那樣一種重門閥世系的社會氛圍中，士人能有一個驕人的出身，簡直是太重要了。此四人中王勃年紀最輕，又有家族的聲望，當然有人在長安為其延譽，所以他尤其引人注目，完全有資格作為這批新興文人的代表人物。

當然，歷來英雄是不問出身的，尤其是秉持天才的少年英雄。這一點是必須更明確地認識到的。四傑中人都早慧，除盧照鄰之外，文獻明載王、楊、駱少有「神童」之譽。據《舊唐書》本傳：王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劇才藻相類，被父友杜易簡稱賞為「王氏三珠樹」。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十二歲，從曹元習醫。十五歲，上書右相劉祥道，祥道表薦之。十七歲，對策及第，為朝散郎，沛王李賢徵為侍讀。十八歲，撰《平臺鈔略》十篇。十九歲，上〈九成宮頌〉。此後有過數年頗不如意的宦遊。上元二年（西元六七五年），二十七歲，由龍門老家出發，開始隨父赴交趾。九月途經洪州，與閩都督宴會，作〈滕王閣序并詩〉。王勃一生短暫，著述卻極為豐富。據各種文獻記載，他詩文富贍，學術著作亦夥。除以上提及的幾種之外，還有〈舟中纂序〉、

《周易發揮》、《次論語》、《大唐千歲曆》等，惜多佚失。少年楊炯亦博學善屬文，而且有著特殊而光榮的學習、供職經歷。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年），十歲即舉童子科，待制弘文館。弘文館建於唐武德四年，原名修文館。聚四部書共二十餘萬卷，選入天下名儒，負責詳正圖籍、教授生徒，並參議朝廷禮制。楊炯在這裏有機會閱覽豐富的藏書，受名師指教。這一時期對其以後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上元三年，楊炯二十七歲，以應制舉及第，補秘書省校書郎。他意氣風發，以登秘書省這樣的「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為榮，「陶陶然樂在其中矣」（楊炯《登秘書省閣詩序》）。永隆二年（西元六八一年）左右，皇太子舉行祭奠先聖先師禮儀，啟蒙讀書，中書侍郎薛元超舉薦楊炯、祖玄、鄧玄挺、崔融等人充崇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司直。盧照鄰十歲左右即跟從揚州曹憲讀《蒼》、《雅》，後北返泗州漣水王義方的家鄉或洹水王義方的任所學經史。可見其雖無明確的「神童」之譽的記載，但也絕對是早慧者。永徽三年，在長安參選。約永徽年間或顯慶（西元六五〇—六六〇年）之初，年在弱冠時，經長安入蜀遊宦。未求得差事，便在梁州入了鄧王府。《舊唐書》本傳載：「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駱賓王六歲開口詠鵝，一時傳誦鄉里，被譽為神童。約十歲隨父母居博昌，就學齊魯。二十歲左右由瑕丘赴京應舉，落第後南歸義烏。約於顯慶三年，為道王李元慶府屬。麟德元年，為應嶽牧舉，先後上書司列太常伯右相劉祥道和李少常伯某，希望援引。乾封元年（西元六六六年）左右，應舉及第，拜奉禮郎，為東臺詳正學士。可見，此四人都不同凡響的稟賦，足以讓人對四傑中每一位人的才華表示驚服。但最終我們還是不得不說：四傑都是傑出的，而其中王勃是最傑出的！

四傑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主要活動在高宗、武后時期，此時唐王朝已建立三十多年，經歷了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通典·食貨典·戶口》載：「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

穩。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此時版圖東至日本，南至印尼，西到歐洲，西南到非洲北部。國家的統一和強大，增強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南北、中外的文化交流，各種意識形態的相互滲透，擴大了人們的視野，豐富和提高了人們的精神境界，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另外，隋末農民抗爭有力地衝擊了門閥士族的統治，唐代中下層庶族地主由於均田制的實行迅速發展起來，促使社會結構、統治集團內部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貞觀時期，唐太宗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刊定公布按新標準修定的《氏族志》，並實行科舉考試取士，主張「釐正訛謬，捨名取實」，按人們的「德行」、「勳勞」、「文學」來確定其社會地位。這些措施給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嶄新的希望，激發了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和以文顯名的積極性。四傑就是被這樣一個時代催生的早熟文人。政治上的強烈要求、經濟上的優勢、源遠流長的家教和世代相傳的文化積累，為他們的早熟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最重要的是，他們本身又有特殊的天賦，故特別突出，引人注目。

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總是有它的兩面性。就社會總體的形勢而言，當然是光明堂皇的，而在另一方面，又存在陰暗和不和諧的因素。原先的士家大族固守著自己的堡壘，看不起異族而起的李唐王朝，認為李唐統治者是蠻荒之人。他們的經濟、文化的地位優越性似乎很難動搖，但李唐王朝打擊他們，使他們的政治地位不斷下移。例如，在唐統治的核心成員中，幾乎找不到山東舊族勢力的席位。後來他們要入仕，就不得不參加科舉考試。高宗時，表面上政治、經濟正常穩步向前發展，而實際上新舊交替鬥爭在潛流湧動。顯慶以後，經過激烈的鬥爭，武則天垂簾聽政。她為打擊、削弱皇戚勳室，大肆收買人心，大開科舉之門，使得大批來自下層的才俊積極參政。「四傑」正生活在這政權交替的敏感時期，他們卻又並非武氏所需要的人物，因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分屬武氏打擊的沛王、太子、鄧王、適王等王府僚屬。儘管他們博學多才，而且很早就頗負文名，卻較少人情世故的歷練，難免在性格上有著大大小小的缺陷。他們有一個共同而顯著的特徵，即恃才傲物，行動也不夠檢束，為社會一般禮法之

士所嫉惡。

他們命運慘澹，都有曾流落蜀中異鄉的經歷，又都曾遭牢獄之災，並不得善終。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春，王勃因戲為〈檄英王雞〉文，無意間觸及統治階級上層內部爭權奪利的敏感神經，高宗動怒，立被斥出沛王府。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秋，由蜀地返抵長安。在選曹，李敬玄盛為延譽，而裴行儉貶損之。為改變印象，求得理解，因作〈上吏部裴侍郎啟〉。參選結果補為虢州參軍。咸亨四年冬，因擅殺官奴犯罪當誅。上元元年八月，遇大赦出獄，除名。楊炯在宮闕省中，亦自視甚高，遭人忌恨。武后垂拱元年（西元六八五年）四月至十二月間，楊炯三十六歲時，終因受從祖弟神讓參與徐敬業起兵討武后之事的牽連，出為梓州司法參軍。約天授元年（西元六九〇年）或如意元年（西元六九二年），楊炯自梓州還京，不久被選為盈川令。張說為他送行，並贈送為官箴言，告誡他要嚴格苛刻。楊炯到任果以嚴酷而留惡名，官吏稍有忤意，就笞撲或殺死。約武后長壽二年（西元六九三年）卒於盈川任上，終年四十四歲。盧照鄰為鄧王府典籤後不久在兗州遭橫事被拘，得救免後又有入蜀之舉。約龍朔二年（西元六六二年）春隨軍至漠北，春末仍由河西返京。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為新都尉，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年）秩滿。總章二年（西元六六九年）五月，又從鄧錡奉使歸蜀。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春返洛，不久又遭縲紲之災。滯留兩年後臥病長安，居太白山中，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又在咸亨三年染風疾。因治病向孫思邈執弟子禮，學老莊及醫學。後客居東龍門山，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人常常給他供衣供藥。最終徙居陽翟縣茨山下，因難以忍受長期病痛的折磨，竟和親屬訣別，自投潁水死去。卒年不詳，死時當在五十歲左右。盧照鄰身經太宗、高宗、武后三朝，一生鬱鬱不得志，往往與時相忤，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典型的悲劇文人。駱賓王亦曾在東臺詳正學士任上因事被謫，從軍西域。咸亨三年左右，在姚州道大總管李義軍幕，平蠻族叛亂。約於上元三年（西元六七六年），為關內道京兆府武功主簿。此時恰值吐蕃入西州，上安西都護裴行儉請求從軍作詩中極言其苦無出路，而嚮往軍旅生

活，並信誓旦旦云：「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而時隔一月賓王又有〈上吏部裴侍郎書〉，以母老辭職，從軍之事未成。大約因此種反復之事，高高在上的裴行儉頗感嫌惡。儀鳳三年（西元六七八年）駱賓王母喪服闋，補授長安主簿，旋遷侍御史。任上因向武則天上書言事，被誣任長安主簿時贓罪入獄。文明元年（西元六八四年）九月，武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立小兒子李旦為帝，親自執政。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武，駱賓王毅然加入起義的行列，被署為藝文令，掌文書機要，並代徐敬業起草〈討武氏檄〉文。此文一時天下傳誦，賓王成為朝野矚目的人物。十一月，起義失敗，徐敬業等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殺，傳首東都。駱賓王則下落不明。或以為兵敗後被殺；或以為兵敗後投水自殺；或以為賓王逃遁後出家為僧；或以為賓王兵敗後隱居於今江蘇南通一帶，或客死於崇川，或終老於潛；或以為老死義烏。

據《舊唐書·王勃傳》載，吏部侍郎裴行儉曾給四傑這批才士一個極低的評價，稱其雖「有才藝」而「無器識」，「浮躁淺露」。這個評價，可以說是當時封建正統階層對他們的普遍認識，並且謬種流傳，後世亦有響應者。如《韻語陽秋》卷三稱：「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竹莊詩話》卷一「品題」引《雪浪齋日記》云：「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炫鬻以為文耳。」話說回來，四傑之所以「浮躁淺露」，正是因為這些沈淪下僚的才士心中埋藏著一種對社會不公正秩序的鬱憤怨怒。不其然乎？四傑如此早熟，且才華如此特出，他們的思想其實又較為單純，在骨子裏都是崇奉儒教的，在新時代的蓬蓬勃勃的社會風氣的鼓煽下，他們的入世態度格外積極，夢想及早建功立業。然而，他們在本質上屬於典型的書齋中的文儒，而非當時社會上一般的文吏。所以與高宗、武則天時期重吏才的時代風習格格不入，動輒得咎。他們經歷曲折坎坷，最終沈淪下僚。人生命運的巨大不平衡，撞擊著他們的敏感的心靈，其深痛是常人難以揣度的，有時不得不借助佛道的精神來排除內心的痛苦。在這一點上，四傑中以盧照鄰最為突出。

四傑中人，王、楊、盧有明文記載的交往經歷，而駱賓王除與盧照鄰有過關係外，與王、楊均無明

確的交誼可考。總章二年，王勃因戲為〈檄英王雞〉文而被斥出沛王府，無疑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突然而巨大的打擊。本年秋季，王勃與楊炯同在華陰楊炯老家小住，他年輕而失意落魄的心靈得到友誼的安慰。王勃赴蜀後，心情抑鬱、憤激而不消沈，在創作上取得了豐收，就與這種友誼的鼓舞是相關的。朋友們都注視著他的創作成就，「每有一文，海內驚瞻」（楊炯〈王勃集序〉）。在蜀中，王勃除了眾多的詩作之外，還寫了〈九隴縣孔子廟堂碑〉，轟動一時。不久楊炯也寫了力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這種在互相瞭解、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創作競賽，始終是王、楊交誼的一個特點。而王勃與盧照鄰相交的過程似乎顯得有些複雜。楊炯〈王勃集序〉稱：「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提到了盧照鄰與王勃共同反對龍朔文風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一覽清規而輟九攻一句，前人注釋已指出，「九攻」出自《墨子》（見《王子安集注》），意即多次攻擊。從今天留下來的盧照鄰的作品，無法確知楊炯所謂「九攻」的具體內容，只能推測在盧照鄰得悉王勃的主張之前，他「九攻」的人物可能是王勃，也可能是其他文人。然而在看到王勃反對龍朔文風之後，盧照鄰開始追隨王勃。龍朔二年，盧照鄰赴蜀時經長安，對王勃反對上官體表示支持，引為知己。此時王勃才十三歲，盧照鄰已二十九歲。咸亨三年王勃二十三歲，春居長安，參加友人曲水宴，作〈三月曲水宴得煙字〉，即是和盧照鄰之作。時盧照鄰居太白山，間至長安。駱賓王與盧照鄰當有過較深的交往。高宗咸亨四年春，駱賓王從軍西域後返回，又經由蜀中出征姚州。在逗留成都時，遇上盧照鄰的舊情人郭氏。郭氏向駱賓王訴說與盧照鄰的戀情及別後相思，駱賓王為之代筆作書，寫下〈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鄰〉詩。此詩借郭氏之口，譴責了「負心漢」盧照鄰以替郭氏出氣，儘管這是一場徹底的誤會。倘曾經沒有相當密切的交往，駱賓王不會有此深刻的關懷，更不會寫此詩。

四傑之並稱，為四人並世且才名相敵之時即已出現。劉開揚《唐詩通論》第二章第三節中稱：「四傑稱號出現的時期，當在龍朔（西元六六一—六六三年）和麟德元年間。」又在〈論初唐四傑及其詩〉

一文中稱：「（盧照鄰）在龍朔以後看到王勃的反對上官體，便停止對王勃的攻擊了。王楊盧駱四傑的稱號應該出現在這一時期（《新唐書·裴行儉傳》載行儉在吏部時，李敬玄盛稱四人之才，引見行儉，又載行儉任吏部侍郎在麟德二年，緊接龍朔後，這裏可以窺見四傑稱號出現的時期）。」四傑的並稱主要的是因為四人文名相當，那麼四傑的排名順序也就具有了品評文學成就高下的意味，成了一個文學批評的問題，這也是自唐代以來關於四傑的一個引人注意的話題。縱觀唐代關於四傑的記載，最常見、最有影響的排序就是「王楊盧駱」。如宋之間《祭杜學士審言文》：「後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雲街。王也才參卿于西陝，楊也終遠宰于東吳，盧則哀其棲山而臥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明確提到了四傑的排名。該文作於唐中宗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年）。另外，《朝野僉載》、《大唐新語》中也都採用「王楊盧駱」的排名。似乎當時人對此都沒有異議，其實不然。唐代文獻中提及四傑時，也有不採用王、楊、盧、駱的順序的情況。如張說的《贈太尉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郝雲卿《駱賓王文集序》：「駱賓王……高宗朝，與盧照鄰、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為四傑，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張說碑文與郝雲卿序文均以盧、駱居前，王、楊居後，有學者認為，張、郝二人文中的順序並非品第高下，而是按年歲排序。四傑中人對排名也頗有異議。《舊唐書·楊炯傳》載：「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嘆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新唐書》所載略同。四傑中對「王楊盧駱」這個順序提出異議的並不只楊炯一人。《朝野僉載》卷六載：「盧照鄰……後為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于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與楊炯不同，盧照鄰似乎對王勃排名在前非常贊同。